



国防大学 2 071 0218 8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36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板荡催时变，螭珊向光明 周士观（1）

——九十生平自述

家世和幼年——辛亥革命时期的隐遁生活——
初入仕途——威斯康辛大学的四年——幻梦破
灭——欧美之行——一次错误的旅行——两种
错误的选择——转折的开始——为争取和平民
主而斗争

耆年自述

解放战争时期“川大”反美反蒋斗争的回顾

..... 彭迪先（36）

“李实育事件”和坚持开除三青团骨干肖连荣的
斗争——“三教授事件”——全校教授罢教三天
揭穿“金圆券”的“货币魔术”——粉碎国民
党反动派策划发行“地方流通券”的阴谋——驳
斥“美苏大战即将爆发”的谬论——关于举行
“尊师运动大会”的斗争

忆述我当年在大陆工作片断 李默庵（50）

附：李默庵给全国政协常委覃异之的信
去台湾及返回大陆前后……………毛翼虎(61)

华侨抗战史料

忆蚁光炎先生及泰国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
……………许侠(75)

参加泰国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回忆……………杜英(83)

七七事变后的募捐运动——周恩来的亲笔信
——十八涌跑马场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据点
——日军入侵后成立“泰国抗日义勇队”——在
敌人眼皮下为《真话报》建立地下印刷厂——战
后进步侨团蓬勃发展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军事史料

军调部大同三人小组工作纪实……………李晋忻(90)

偶然调用——重临古都——初次受命——飞往大
同——小组会议——骆驼庄调查——坦克·日军
——朔县易手——大同请愿——白土窑前——偶
逢赵尔陆——记者仓夷——访问朔县——乌云密
布——小组撤退——停职反省——再到大同

CC 内幕

“二陈”与国民党 CC 派……………袁英林(113)

CC 的来历——CC 头目陈果夫、陈立夫——CC

派对国民党党务权的夺取——CC 在行政方面的扩展——造就 CC 分子的大本营——第三处与中央政校毕业生指导部和同学会——CC 派在经济方面的渗透——CC 派插手教育、文化、宣传等方面的情况——CC 与中统

CC 派与反 CC 派在江苏的一场斗争 杨 谷(127)

文化史料

王昆仑先生和潮剧 林淳钧(131)

忆戏剧教育家刘仲秋 阿 甲(141)

追忆夏声戏校与演剧九队的关系 吕 复(145)

经济史料

去台湾采矿炼铜的经历 张正容(148)

孔祥熙与复兴公司 宁麟南(152)

参考资料

武汉国民政府辖区的演变

..... 毛 磊 刘继增 袁继成(158)

日本外交档案中有关孔祥熙暗中与日本

和谈的记录 杨 凡译(179)

补充·订正·质疑

谈杨乃武与刘锡彤的仇恨 何桐森(186)

板荡催时变，嬖珊向光明

九十生平自述

周士观

作者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常委、副主委，全国政协常委，一九八四年去世。

本文由周士观口述，经许汉三整理而成。因周士观年高体衰，记忆力减退，故自述后面部分仅存大概，这是引以为憾的事。

家世和幼年

我出生于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五月。出生地点是福建的闽侯县（现福州市）。十岁以前，一直住在闽侯。

闽侯县在中国近代史上真称得上是人文荟萃之区。清代中国改革派的先驱者林则徐；稍后以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严复和林琴南，以及晚清同光诗派的重要成员陈衍、陈宝琛、郑孝胥等都是闽侯人。

我的父亲名登俦，是光绪举人。后经大挑实授知县，就一直在京兆尹所属的宁河、武清、霸县、大城、东安等县任知县。以后因考绩优异，被擢升为赵州直隶州知州和都察院广西道御史。辛亥革命以后，又曾任过肃政史和绥远道尹，还代理过绥远都统等职。一九四〇年在上海逝世。

父亲算是上层的官吏，又是福建闽侯人，旧诗词都很有根底，和同光派诗人陈宝琛还有亲谊关系。

父亲的政治历史和闽侯的乡望，都对我的一生有一定影响。解放以前的几十年，我大部分的政治活动都和西北的马福祥、马鸿逵父子有关，其原因就由于我的父亲和马福祥是多年的同僚，且结成了挚友。

我从大学时期到留学美国，都是学习应用化学的，有一个时期又专学军用化学。可是在我的中年时期，却醉心于封建文人中名士派所艳羡的“四雅”——琴、棋、书、画，我的几个妹妹也都擅长诗画。这就同我出生于闽侯县有关了。

在我的中少年时期，正是同光诗派的极盛时期，我喜欢林琴南、陈衍、樊增祥、易实甫等的诗，而且崇拜他们。我曾有诗句云：“看过夫人都似婢，果真国士愿称奴。”这是把林琴南等视为国士的。我当时的喜尚，于此也可见一斑。

我的青年时期，一直是跟随着父亲，即所谓“随宦读书”的。所以在我十岁离开闽侯北来后，在宛平和宁河等地度过了我的小学时期。

一九〇六年我进入了天津客籍学校。这个学校是中学，但又不同一般中学，是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所创办的贵族子弟学校，专收大官僚的子弟。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袁克文等都在这个学校读书。

袁世凯当时用河工经费办了这所学校。他用厚薪聘请了当时学术界的一些名宿来任教，如教经学的孙师郑，教历史的方地山，在当时都是很有声望的学者。

袁世凯办这所学校还有一番深意。袁世凯由于小站练兵，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后来，正是这批干部成了北洋军事势力的基础。但在政治干部的培养方面还是空白。

清朝以八股取士，一直重视正途出身（即科举出身）的人。袁世凯自知在政治上有很大弱点，如不是依靠他祖父和父辈的勋望及

他在朝鲜的军功，他是很难爬上高位的。所以在一九〇五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改设学堂之后，他就积极在教育方面表示意见，并且办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专收大官僚的子弟。据当时的传说：袁世凯认为这样的学校，除了给他的子侄辈以受教育的机会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他的儿子在尔后的政治活动中，培养一批较为密切的朋友，一种力量。对袁世凯本人，也是造就一批未来的政治支柱，因为这些贵族子弟，将来都会依靠他们各自的父兄力量，很快地走上政治舞台的。

我的父亲当时还是知县，作为知县的子弟的我，原没有资格进这个贵胄式的学校。可是因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我的父亲在小站附近几个县做过知县，政绩卓异，为袁世凯所赏识，所以得以破格地进了这个学校。

我当时在这个学校中年龄最小——十三岁，父亲的官级又不高，因而常常受那些大官僚子弟的欺侮。当时那种不平等的情况，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使我的心灵上受到很大创伤，也滋生了我的反抗思想。

我常常受到凌辱，也常常向学监面前控告，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学校当局都是些逢迎拍马之徒，明知我是受屈的，也不敢替我说话。甚至还会颠倒黑白，站在那些大官子弟一边，来申斥我。我年纪虽然最小，但却很有力气，因而遇到这种不平，我就采取直接行动同欺侮我的人对打，并且常常取胜，那些大官僚子弟的气焰也从此稍有收敛。

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当然是不会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后果，气自然是出了，可是其后果就是转学。一九〇八年，在我十六岁时，只好转到北京的顺天中学。

在顺天中学中，两个同学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是张申府，一个是梁漱溟。这两个人在抗日战争时，都是知名的民主人士。由于中学是同学，往来比较多，谈话也比较随便。只是由于政治上彼此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后来就各自走了似同而又不全相同的道路。

张申府和梁漱溟在中学时期都有奇特的表现。两个人都喜欢离群索居，作深湛之思。张申府喜欢数学，后来成了我国有名的罗素派的哲学家。梁漱溟幼年受继母虐待，曾一度想遁入空门作和尚，因为不成功，就转而研究佛学，在很年轻时就写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被蔡元培破格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他们的学术主张和政治见解，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当然值得商榷的地方不少。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学术界，都曾产生过一些影响，也是事实。这说明一个人，只要肯于用思想，肯于研究问题，还是可以取得成果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隐遁生活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的胜利果实虽然为袁世凯所篡夺，但它推倒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种伟大的功绩已载之史册，是尽人皆知的。而且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由于民主主义的深入人心，使此后的一切野心家，想做皇帝的，或者想做变相皇帝的，都碰得头破血流，成为历史的罪人，这就更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了。

可是，这震动中国大地的革命浪潮，对于我却并没有什么影响。我当时十九岁，已是成年人了。在南方，许多十五六岁的青年大批地投入军中，参加了革命，而我却随父亲隐居在宁河县的芦台镇。我们的家所以迁居芦台，是为了逃避第三镇的兵变。

在芦台我闲居了一年多。除了涉猎一些笔记小说和诗词，以消磨时日外，就是向芦台运盐工人中有武功的人学拳。我本来身体就很好，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拳术有了一定的基础。我以后身体健康，晚年精神颇佳，也和这时的练拳有关。

处于革命的激流之中而没有革命激情，今天想来似乎奇怪，然而据我当年的家境影响来看并不足怪。我的父亲当时是清朝的官吏，又一向为人清正，他平时自律并以之教育子女的，都是儒家传

统道德观念。父亲也知道清王朝的崩溃，已是无可挽救；然而要他对一向所忠心尊戴的君上，转脸又当作仇敌而诟骂之，打倒之，则认其为道义所不允许的。

父亲可以不作保皇派，但也不能作革命派。他只能暂时迁居芦台，静观时局的变化。而我一向是非常尊崇父亲的，也只能一切遵照父命而行。所以虽然在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之中，我不但没有准备，甚至思想上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这场革命中应该有什么行动。

初入仕途

一九一二年，父亲把家庭由芦台迁回北京，以后出任了袁世凯政府的肃政史。我本人则于一九一三年考入了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应用化学。一九一七年毕业，参加文官考试，录取后被分发到农商部实习。

一九一八年，我的实习期满，被正式分发到该部的工商司担任技士，同时兼任国务院秘书厅的科员。这样我总算是作了官吏了，虽然是初入仕途，而且是低级的官吏。

当时北洋政府的各部、院会，因袭着浓厚的清王朝的腐化习气。在国务院的秘书厅中，我听到各部的总长们不但把八大胡同（过去妓院的集中地）作为他们日夜行乐之所，而且国家的许多重大军事政治问题，都是在八大胡同的妓院中，在玩乐嬉戏中决定的；一切肮脏污浊的交易，也是在那里达成的。

我当时还年轻，刚出学校不久，看不惯这种腐败污浊的现象，因而就寄情于琴、棋、书、画的所谓“四雅”，以消磨岁月。

工商部的工作与我所学的专业一致，原是可以展其所长的。但是那里的现象，却使我难安于位。一九二〇年的春天，我奉到上级命令，要我审批一桩申请复写纸专利权的案件。批准专利权，原是保护科学技术发明的有力措施。但若给予享受专利权的，不是先进

的发明，市场上已有优于申请专利权的同类产品存在，那末，这种专利权的颁予，就不是保护先进的技术发明，而是保护落后的产品了。这原是极易判别的是非问题，但在贪污横行的北洋政府中，完全可以颠倒是非，使你无可奈何。

我接到审查复写纸专利权的申请时，还没有着手审查，科长就告诉我：司长和次长都很注意这件事，希望能给予专利。为什么还没有审查，上级就暗示给予专利权呢？这是因为这个复写纸的制造商已经先同工商部的次长、司长们讲好了利益分成条件，他们既然利害相关，自然要力促其成。我懂得这其中的奥妙，但不愿意作这班人的工具，与他们同流合污。我在作了技术检验之后，发现申请专利的复写纸，不仅不及日本产品的质量，也不及商务印书馆产品的质量。如果为抵制日本产品，保护本国产品，就是质量稍差一些，也可以给予批准。但它连商务的产品也不如，如果给予专利，岂不是打击先进！因而就坚决不同意给予专利权。

但是，我当时是到部工作不久的低级职员，无权改变上级的意见。相反，上级倒可命令我必须贯彻他们的意图。这时我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违心地执行上级的命令，促成他们的肮脏交易；要么自己辞职，让别人去做。于是，我就在回家同父亲商量后，毅然决定辞职，出国深造。

威斯康辛大学的四年

一九二〇年夏天，我离开北京，放洋赴美，考入了威斯康辛大学，继续攻研化学。

就在我栖身舟中，飘行于淼茫浩瀚、万里无垠的太平洋中时，国内又发生了直皖战争。皖系垮台，直奉系抬头，政治更加腐败混乱，军阀间的战争连绵不断。我当时二十六岁，不能不把自己所学的专业和个人的前途联系起来考虑，也不能不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考虑。

在当时知识界的大多数人中,大都不能用正确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用来研究事物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但都有一种朦胧的爱国、救国思想,大多数人都想用自已的所学,为振兴中华贡献力量。但要走的道路却各不一样:有的认为教育可以救国,有的认为实业可以救国。我当时则是信仰后者的。所以在威斯康辛时,我选择攻读应用化学;考虑到回国后自办工厂,原料上不致于仰赖外国,又特别注意于油漆的研究和制造。我认为油漆的用途很广,原料又很丰富,可是国内的油漆却仍用土法制造,产量太小,供不应求,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漏卮之大,实在惊人!“挽回利权”,不正是报国的一途吗?我觉得自己在研究和将来职业上的选择,是正确的,完全符合高尚的救国的目标。

我在威斯康辛大学的图书馆中,看到许多美国在华传教士发回去的大量报告。这些报告对于中国高山大河之美,关塞厄隘之险,风俗、人口、物产、道路,都记载得十分详细,并且常常附有照片说明。

我还发现那些报告,有明显的两种倾向:一是渲染中国的落后;一是渲染中国的富饶。最初,我颇敬佩外国人的研究精神,认为这些外国人对于中国所作的调查工作,远远地超过那些尸位素餐的中国官吏。这种看法在留学生中一向是相当普遍的。

后来我想:他们这样做总有一个目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似乎和传教无大关系。如果是为提供中国建设作参考,那为什么不就近送之于中国政府,却寄回万里之远的美国呢?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些虽然是传教士个人的一种活动,实际上却隐藏着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阴谋,这还是当时在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活动的共性。认识了这一点以后,就更坚定了我的工业救国的思想。

我在威斯康辛大学两年,取得了硕士学位。这时我踌躇满志,摒挡行装,购买了大批专业用书,准备买舟回国,施展自己的救国宏图。

我在美国学习时,大大受益于美籍德国人卡伦伯教授。卡伦伯

为人正直，教学态度非常认真，对学生的要求也特别严格。他对我的返国并不十分赞成。一天我正在整理行装，卡伦伯教授来到我的寓所，寒暄几句之后，对着我所买的大批书籍，他意带讥讽地说：“周先生，你是把化学的知识都买回去了，这很好呀。可是你要注意，万一在路上发生了意外，你的书沉落在海底了，那你怎么办？难道再回来就学么？”言外之意是说，在化学方面我的知识还不够坚实，还需要继续深造。

卡伦伯教授带有讽刺意味的几句话，对我触动很大。经过冷静的考虑，觉得我虽然已取得硕士学位，但自己所学的确实不多，不坚实，有许多重大的化学问题，不能独立解决，因之自己不能自欺，更不能以硕士的招牌欺人，遂决定留下来再学。于是我继续学习了两年半，共在美国学了四年半。

在留下来继续学习的两年半中，我进一步认真地研读了机械化学、实用化学、电化化学、有机化学以及工厂建筑和管理学等理论和实用的知识，对化学方面的知识有了进一步的收获。

我当时认为要振兴中华，一定先要做到“炮利船坚”，要加强军事工业。所以在学习一般功课之外，我还暗地里向卡伦伯和费司两个教授学习军用化学的制造和防御。

我在国内和国外所学的，都属于应用化学。我怕自己所学的和实际脱节，还特请费司教授介绍我在德国的一个油漆工厂实习。实习时，我有意识地从简单的洗铁片第一道工序起，一直到管理处的最高管理工作止，每一个车间，每一道工序，都不是看，面是确确实实地亲自动手做，直到真正懂得、学会操作为止。这样一直干了六个月。

幻梦破灭

我于一九二〇年赴美，一九二五年回国。在留美的四年多时间里，国内的思想界在振兴中华、改造中国的道路问题上，发生过为

时不短的论争。这次论争波及到国内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但主要的方面是两个：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彻底革命派；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承认现状的改良派。

我并没有参加这次论争，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根据我当时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关系，是天然的承认现状派。我虽然也不满意军阀的混战和北洋政府的腐败，甚至还自以为抱有一种纯洁无瑕的救国之心，然而我理想的顶点，也不过如马克思所说：“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已。

在我未动身回国之前，国内南北对峙的形势更加尖锐。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势力在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后，正如风扫电击，所向无敌。但我没有重视那个新生的势力。其原因一是对国内的情况了解不够；二是代表国民党的邵元冲和我在威斯康辛同学两年，给我的印象不佳。

一九二五年春天，我回到了我愿为之献身的祖国。但我完全没有想到：在美国勤奋苦学的一套本领，竟然到处碰壁，毫无用处！

一九二五年，我的父亲周登峰还在担任绥远道尹，我先去绥远省亲。绥远的都统是马福祥。在我奉父亲之命去拜见这位和父亲友谊很深的父执时，马福祥得知我是留美国的硕士，而且学有专长，真是说不出的高兴，马上就设立一个实业开发筹备处，以后正式成立实业厅，派我主持其事。

我对马福祥的这番热情，是既感知遇之恩，又喜有了用武之地。所以在受命之后，就以最饱满的热情，去搞绥远省资源的调查。

绥远省地处塞北，过去是百里无人，风沙连天。我带着两个马巡（即警卫员），架着一辆骡车，风餐露宿，问老卒，访荒村，经时数月，几乎踏遍了绥远全境。

我发现绥远虽然素称贫瘠，但资源却很丰富。土碱、铁矿、甘草、枸杞、头发菜、红萝卜等，产量很多，都是很好的轻重工业的原料。特别是清水河（即包头）的铁矿，我不仅进行了调查，而且用土法炼成了钢锭。

马福祥看了我炼出的钢锭，又听我介绍了全省资源的情况，开办实业的思想更加坚定，决定由绥远筹集资金，先从开采铁矿动手。而我本人更是兴致勃勃，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已到，就积极草拟计划，搭建班子，动起手来。不料我们的开采计划送请农矿部批准时，农矿部的工矿司长却说已经有人申请开采在先，绥远的请求不能同意。这样一来，就使我半年多的辛苦调查付之流水；我在工业上的绮思美梦也完全破灭。可是据我事后了解，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北洋政府垮台，还没有听说有什么人准备在绥远开采铁矿！

绥远的开发实业计划既然成了泡影，我就决定自己开办油漆工厂。我的集资对象，多数是北洋政府的军阀和官僚。筹集了二十多万元，就在天津西开购地建厂，订购机器，积极进行。可是工厂还没有正式开工，由于政局的不断变化，股东纷纷撤股，准备遁逃。工厂因此夭折垮台，自己反而赔了两万多元。罄其家中所有的积蓄，才了清了这笔欠债。

在筹办油漆工厂时，我还附带建立了中华化学工艺社。内部设立了化验检定、工业设计、代购机器书籍及国内外工业咨询等四部。把理论研究、设计咨询和实际业务，并成一体，携手并进，相互促进，计划可以说是完美周密的。可是也因为集资不易，而四部的理想负责人尤不易得，也只是存在了几个月，便宣告瓦解。

到这时，我的工业救国的雄心，已经荡然无存。但还需要有个噉饭之地。于是，我通过我的亲戚曾毓雋见到了当时的执政段祺瑞，要求在执政府中设立一个军用化学研究机构，由我负责主持，研究军用化学，以为将来国家军事上的非常之用。

这个时候，我在归国以前的一切幻想，已经基本破灭了。我虽然在口头上，乃至在用文字写成的“条陈”上，振振有词地讲，设立这个研究所，是为的政府，为的国家民族，实际上我知道人们是不相信的，也从来不这样考虑问题的；一些人考虑的，首先还是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应该说，我的条陈又何尝不是一片违心的话呢！大家都在谎言中过日子，这是历来官场的习气，你无法改变它，甚至

也无法逃避它。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曾毓隽是段祺瑞的亲信，在段面前说话有力量。我和曾不是一般的关系，曾也用了他的一切力量来促成此事。然而并不成功，其原因就是段祺瑞考虑的，不是军用化学的研究在中国是否需要，而是这么一个小小研究机构的设立，会不会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

一九二〇年前，段祺瑞可以说是北洋政府中最有权力的实力派。段的为人，言行十分果决，但在他执政时期，情况完全两样。一九二四年曹锟的垮台，是冯玉祥和张作霖联合倒直的结果。由于冯、奉两方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控制北京政权，所以才把段捧出作为傀儡执政，以缓冲两方的冲突。段是没有多大实权的，还要时时提防冯、冯两方任何一方的怀疑。所以在我 and 曾毓隽把计划对他陈述后，他十分诚恳而又为难地说：“中国的军事装备武器等非常落后，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军用化学更是落后。你建议设所研究，确是中肯之见。我自己从前参加小站练兵，以后置身军旅，民国以后执政中枢，无时不以整军经武为念。虽然迄无成就，且多经变故，为人诟骂，但富国强兵之志，却老而不泯。可是我现在虽身为执政，却无能为力。涉及军事方面的大小事情，更要慎重。如果我批准设立这个机构，本来是应你们所请，且于国家有利；可是别人将会怀疑这其中或另有文章，结果这件事未必能顺利进行，反会引起别的麻烦。我看此事以搁置起来为好。”

段又说：“至于你，既然有志于军事工业，我可以介绍你到山东看看。张宗昌现在是山东督办，又有德州兵工厂的基础，这个人为人豪爽，很好合作。你去试试，也许会有办法。”

一九二六年，我持着段祺瑞的介绍信，同曾毓隽一道到了济南。曾毓隽的同往，大大地增重了段的介绍信的力量。因为曾毓隽是执政府的要人，他的陪往，证明段的介绍，不是浮泛的应酬。张用热诚的态度欢迎我的到来，马上发表我为山东省署技师兼任德州兵工厂副厂长（厂长由张的亲信，可能是督办公署的参谋长兼任）。

张宗昌豪爽地对我说：“你来搞兵工厂，太好了。我非常希望能

把这个兵工厂办好。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将来办好了留着打日本人用。”

张宗昌是绿林出身，在北洋军阀中被称为“狗肉将军”。在政治上一贯反对进步，摧残革命，鱼肉人民，横征暴敛，罪恶昭彰，又利用白俄军队，参加内战，杀害同胞无算。在生活上他又“三不知”，即不知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这样一个人竟能在北洋政府中横行一时，实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奇特现象。我当时接受段祺瑞的介绍，去投靠他，并准备替他发展军事工业，当然是一种错误。

幸而事情并没有实现。我受委之后，就到德州兵工厂进行实地调查。德州兵工厂原归陆军部领导，是国营的兵工厂。但因北洋政府的政令多年不出国门，德州兵工厂早已奄奄一息。张宗昌到了山东后，他部下有技术的白俄兵，又把工厂中能用的机器拆迁一空。我去的时候工厂中还驻有军队。原来很大的一个工厂，这时竟变成瓦砾遍地、蓬蒿没人的一片荒凉景象。我和张乍见面时，张的豪言壮语，曾引起我一片幻想，好像一个烟囱林立，火光烛天，机器轰鸣，如像我在外国所看到的那些大工厂的雄伟壮观局面，很快就会出现眼前。不料我看到的现实竟是如此，真使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当时我认为张宗昌虽然慷慨地应诺，“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但以当时兵工厂状况来说，要做到能够正式生产，哪怕生产普通的枪炮，都需要从头做起。确实要花许多钱，也要相当长的时间。当时北伐军正在顺利前进。我和南方的革命阵营没有关系，双方胜负的局面虽然还看不出来，但张宗昌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准备打仗方面，南北方的政治局面很不稳定。

我在德州住了三个月，根据调查结果，写了一个报告给张宗昌。我在报告中说明，德州兵工厂要打算起死回生，具备相当规模，需要从头起步，需要外国的经验，也需要外国的人才。我要求出国作军事工业的专门考察。实际上是借口出国，静待国内的变化。

张宗昌慨然应诺，马上发给旅费五万元，派我和一个同学名陈祖亚的，到欧美考察军事工业，时间定为一年。

我在一九二七年年年初出国，考察未毕，张宗昌已经垮台。我回国以后，南京政府早已建立。从此我的生活也迈入另一个途径。我从事工业的思想，不仅在一再碰壁中彻底破灭，而且从此以后也再没有和工业打过任何交道。“学无所用”，“用非所学”，是旧中国的普遍现象，是多数知识分子的悲剧。

张宗昌的为人，历史早有定论，我前边也有论述。但有两点还不无可取。一是他对母亲孝顺，二是有民族气节。他在台上的时候和日本军阀时有勾结。日本军阀为他出谋划策，卖给他军火，唆使他打内战；他自己为着扩充兵力，争夺地盘，也尽量依靠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和以老子自居的那种气焰，他却不能忍受。他对我说办好兵工厂，将来用来打日本人也是真话。他在一九二八年被国民党打垮后，逃往日本别府温泉居住，和日本军政浪人往还密切，准备依靠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占领东北却很不满。当时日本用各种办法对他威逼利诱，劝他到东北担任民军总司令，利用他和抗日的民军对抗。他始终不为所动。这一点较之王克敏、王揖唐和东北的一些大汉奸，甘心作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鹰犬，残杀中国人的丑类，似乎还稍好一点。

欧美之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美、日等国，被称为世界上科学先进、军力强盛的大国。我们一行的考察，自然以这些国家为主要对象。然而当时我们太天真了。世界上不管任何国家，即使是很开放的国家，对军事都是保密的。尤其是那些处心积虑，日图侵略中国的国家，岂能把自己的军事科学，军事先进技术告诉给中国人？我们路过东京，要求考察日本的军事工业，但奔走了三个星期，到处碰壁，于是决定到美国去。美国是我的旧游之地，自然有些方便。其